



重要言论

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艾思奇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

——写在祖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之际

□ 李 浏

(一)

今年是我的祖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专程来到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看展品，听介绍，详细了解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作出的积极贡献。总书记深情地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作为艾思奇的后人，听了总书记这样的评价，我心里很激动，切实感到历史没有忘记他，我们党没有忘记他。总书记在我祖父诞辰周年到访艾思奇纪念馆，就是对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最大肯定、最大褒扬。

我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列举了对创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开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师，在郭沫若、李达两位先生之后，就提到了艾思奇。我祖父是1966年3月去世的，终年56岁，从学术生命上说，算是英年早逝。2016年是他去世50周年。刚好这个时候得到总书记的肯定，我想祖父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有加。

(二)

艾思奇到底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呢？我父亲李昕东曾经给我讲过，艾思奇很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为暮霭沉沉的旧中国盗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火”。为他带来最大荣誉的，无疑是他25岁时就出版的《大众哲学》（最初以《哲学讲话》书名出版）。1937年4月还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哲学与生活》。《大众哲学》一书，深刻阐明了革命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1935年李公

朴在这本书的编者序中写道：“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李公朴认为，艾思奇写这本书在理论体系上是很用了心力的，对新哲学许多问题的解释，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确，有许多深化的地方。他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确，正是有艾思奇这样一批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名家大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迅速成为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思想武器。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艾思奇结下了不了的“哲学情结”。他们尚未谋面之前，就已经有了共鸣。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哲学与生活》时，曾在百忙之中摘录了多达十几页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著，亦不乏与《大众哲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两人在概括认识发展总规律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也特别注意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来阐明抽象的哲学原理，在《实践论》中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浅显例子。1937年年底，艾思奇到达延安，直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和哲学研究。毛泽东同志1963年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艾思奇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位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为大学出版一套中国自己的教科书，艾思奇承担了主编《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任。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这之前，人们主要学习前苏联为主的西方哲学

经典。所以毛泽东同志得知后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哲学教科书。这部教科书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成果。

(三)

主持延安新哲学会，是艾思奇在延安时期的学术标志事件之一。

新哲学会的成立，是与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理论和哲学的浓厚兴趣分不开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逐渐稳定下来，毛泽东同志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和倡导读书。除马列原著外，他重点阅读研究哲学和军事。随着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毛泽东同志在发奋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还经常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这期间就包括研读《哲学与生活》与艾思奇的交流。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和带动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1938年和1939年，他曾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每周左右讨论一次。

新哲学会是1938年6月在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牵头的三个哲学小组基础上，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共18人发起成立起来的。1940年6月召开第一届年会时，新哲学会已经发展到50多人。艾思奇作为新哲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起草了通告《新哲学会缘起》，发布在《解放》周刊上，介绍了新哲学会成立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缘起”指出，若使理论对实践更有指导意义，研究者不仅要结合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发扬本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吸纳国内外最好的理论成果。

参加新哲学会活动的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理论文化教育工作者等。该会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编辑了一些哲学教材，并经常举行哲学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艾思奇在这期间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939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了约37万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便于人们集中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新哲学会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新哲学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个试验场。它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组织，而且对全国的文化理论界来讲，又起着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受新哲学会影响，在延安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学校都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对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提高理论素养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样，延安以外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延安新哲学会和不少国统区地方的学术团体建立了联系，互相交换学习资料和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延安成为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基地，使各解放区广大党员、干部乃至军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

艾思奇在普及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贡献，是一般人不大了解的。

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第二次留日考入了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他的本意是学习地质科学，发挥云南的资源优势，以推动实业救国为目标。这期间，他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然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

艾思奇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

思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搞哲学的人一定要懂得自然科学。他最早的职业是在上海泉漳中学任物理化学教师。做教师之余，艾思奇常为江苏省委的地下党报《日日新闻》写政治评论，还为“反帝大同盟”起草过宣言。他在上海时期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不仅是个人爱好，也是党组织领导的工作，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举办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写了许多科普文章。艾思奇发表了《谈死光》《谈潜水艇》《火箭》《斑马》《太阳黑点与人心》等一系列科学小品。其中，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内容最受欢迎。他还借自然科学文章抨击时弊，也令读者耳目一新。这期间，国际著名微生物科学家高士其脑部受到感染而患重病回国，艾思奇热情帮助他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他们成为一生的挚友。在延安时期，他又和徐特立、于光远、周建南等人组织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讲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参与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大力倡导自然科学。艾思奇与发现北京猿人的人类学教授裴文申成为好友，他们和温济泽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工人们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社会发展史和自然辩证法，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小麦专家李振声曾提出，他自己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受到华罗庚和艾思奇的启发。艾思奇作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做到了教学相长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他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

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1952年，艾思奇受马寅初校长聘请，在北京大学担任了5年的客座教授，重建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他还“三进清华园”，为清华大学师生讲课，首次提出了“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论断，一时引起轰动。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坂田昌一也提出了“毛粒子”的观点，称赞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五)

艾思奇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良多，而且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传播同样注入了心血和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邀请艾思奇讲课的需求量很大，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聘请他通过电台系统讲授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这样做，也开创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先河。

(下转3版)

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率先突破

□ 本报评论员 胡 敏



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我国发展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新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顺应时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而在战略上布好局，在关键处落好子，选准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又至为重要。

在近日召开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举棋落子，重点聚焦长三角，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长三角区域紧抓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

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更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的讲话不仅为长三角区域顺应变局谋求更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开放作出了最新定位，也赋予了长三角区域在促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新的重大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顺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具有资源、区位、人才、科技等禀赋优势的长三角地区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迅速破解了二元结构困境，带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大大提速，奠定了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出新步伐，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具备了更高起点上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条件。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经济社会优化升级交汇融

合，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去年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放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这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市场萎缩，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不稳定性加大，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长三角区域相比国内其他地区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有条件也有责任肩负起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的重任，在促进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先行探路、率先突破。

“一体化”和“高质量”是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内核，二者紧密衔接。“一体化”是手段和路径。要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

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率先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普惠共享，进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高质量”是内在要求和发展目标。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能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提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打造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样板，形成协同开放发展新格局，开创普惠便利共享发展新局面，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全国发展版图上构筑起坚实的高质量发展板块。

一着棋活，满盘生辉。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长三角区域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先手棋”作用，在促进一体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率先突破、引领示范，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板的能级和位势，促进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

本期导读

“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支持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

——习近平在福建（三十二）

我们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当时我们邀请习近平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当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自此之后，福建省登山协会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广泛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

第3版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华文化基因

第2版